

“想象的共同体”视域下北美早期 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

欧阳立博 张叶鸿

摘要: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阐释了印刷语言的效应以及话语同时性，引发了对文学文本研究的再思考。本文以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为视角，对北美早期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展开探讨。首先，从早期印第安书写的重要作家库柏的小说入手，解析“想象的共同体”在凝聚情感方面的作用，这一概念隐射出北美印第安书写在两个维度上的基本特征——文学作品内容所表达的情感具有影响力，空间上的历史在场证明进而为这种情感提供了支撑。由此，面对因种族差异性而导致的冲突，复杂的身份建构成为可能。此外，通过对其他作者有关印第安叙事的分析，揭示了早期印第安书写中身份建构的演变过程，从而阐释了北美早期印第安书写所体现的印第安精神及民族性内涵。在北美洲这片新大陆上，各类新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一种矛盾但共存的张力，早期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透射出印刷语言及话语同时性对凝结“想象的共同体”的作用。

关键词: 想象的共同体；叙事；印刷语言；话语同时性；早期印第安书写

[中图分类号] I3/7; H31

DOI: 10.12002/j.bisu.4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23)05-0123-11

引言

19世纪，美国印第安人在殖民者的压迫下一直处于弱势的边缘化状态，然而即便如此，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也已经出现。描绘印第安文化的书写者逐渐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发出了日益响亮的声音。若探讨早期印第安书写，需审视其特有文化叙事的形成过程，同时对具体作品进行解读，明确印第安书写如何在日益多元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坚持探索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个人经验，以及如何引起更广泛的受众的共鸣，才能准确评价北美印第安书写的独特地位、发展脉络和主要线索。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认知诗学与文学理解跨学科理论构建”(项目编号: 20WXB008)的部分研究成果。

在理论层面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为阐释北美早期印第安书写的功能与作用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批评视角。这部著作对民族性的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这一概念，此概念与“印刷语言”（print-languages）和“同时性”（simultaneity-along-time）密切相关。该书研究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所拥有的影响力，并深入解释了民族主义所拥有的情感力量：不应以人数的规模来定义“共同体”，而应以人群想象力的规模来进行定义。比如说，即使是最小民族里的一个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其所有的同胞，他与一些人可能从来未曾相遇，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未曾听说（安德森，2016：6）^①，但叙事文化所激发的想象力却仍然存在。由此，“想象的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类似“血缘关系”（kinship）或“宗教”（religion）之类的概念，正如安德森所说，“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5-6）“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以特殊方式组成、具有一定现代性要素的新型关系。借助这一概念框架，本文将重新审视早期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

在作品层面上，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以生动的笔触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阐释了多重杂糅的北美族裔文化的诞生过程，他的《皮裹腿故事集》（*The Leatherstocking Tales*）描写了印第安文化和风情，全面反映了美国早期社会的发展状况。该作品涉及美国西进运动、种族冲突、印第安英雄传说以及美国早期社会生活等主题，从多个层面描绘塑造了印第安人和白人拓荒者的形象。全书共包括5篇长篇故事，本文选取其中的两则（《拓荒者》和《最后的莫西干人》），并结合其他早期印第安书写的作品进行文本分析。对作品的阐释有助于揭示北美早期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起源，它的形成标志着印第安书写中印第安文化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确立。

一、印刷语言的效应与库柏作品中民族精神的建立

印刷语言这一概念来源于印刷资本主义。按照安德森的阐释，建立在社会历史结构基础上的印刷语言可以产生变革效应，它体现了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关系，具有3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印刷材料统一了文字传播领域，使“越来

^① 囿于篇幅，下文在引用安德森（2016）中的内容时仅标注页码。

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33)。传统上认为民族主义的基础在于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血统,但是安德森在印刷资本主义框架下运用印刷语言这一概念,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天然的精英现象。第二,安德森质疑传统的欧洲中心说和民族主义欧洲起源说,他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并不是所有地区都经历过这种分裂与重建的过程,如欧洲就没有这种先例。殖民地的管辖形成了新的行政地位。第三,印刷资本主义内容中最重要科技内容“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fixity)”(43)。总体而言,安德森认为印刷语言是一种被建构的权力语言,是“从资本主义、科技和人类语言多样性这三者间爆炸性的互动中所产生的不自觉的过程”(44)。

印刷语言的效应对分析印第安书写的内容和结构具有参考意义,安德森运用这一概念强调冲突,关注差异性和多样性等问题。印刷语言反映出资本主义和科技的影响,呈现一种混合杂糅的状态。库柏的写作视角中便包含了这一立场,他曾经说过:

一般来说,红人(印第安人)在白人优越的道德和身体影响下就消失了,正如我相信黑人最终也会消失一样,除非他在其他地区寻求庇护。十个部落中有九个逐渐西迁,现在在大草原的广阔狩猎场上,各种民族和语言交织在一起,变得混乱不堪。

(Cooper, 1828: 23)

库柏作品中的印第安主题和冲突与安德森对印刷语言效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通过描绘欧裔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强烈冲突和种族差异,库柏展示了这种冲突和差异对印第安人民族意识的深远影响。19世纪早期,美国边疆地区土地扩张的速度和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已有的13个州的面积已经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的勃勃野心,因此开启了一段野蛮开拓和利用土地的时期。这种野蛮行径在库柏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揭示。例如,《拓荒者》中的比利是一个疯狂的樵夫,他凶狠强悍,将树木视为前进的障碍,毫不留情地加以砍伐。为了经济利益,他毁掉了无数棵百年老树。比利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绝非个案,大批的拓荒者蜂拥而至,大肆劫掠西部的动物、矿产、水产等资源。在这些拓荒者的摧残下,土地成为异化的表现,对北美物产资源掠夺的残酷性显而易见。根据档案记载,19世纪初殖民者开始猎杀北美候鸽,到了20世纪初,这一物种已完全灭绝(埃利奥特,1994: 195)。《拓荒者》中有大量对捕猎场面的描写,捕猎者肆意开枪,从未有一丝犹豫。白人殖民者虽然没有将自己的优越感宣之于口,然而这种理所当然要占领新大陆每片

土地的行为揭示了他们的自我授权以及对自身优越于其他族群的坚信不疑。因此，他们在冲突中惯常使用暴力，有时甚至并非出于经济利益，而纯粹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通过书写者库柏细致入微的描述，新兴资本主义肆意扩张所引发的各种冲突和差异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强调。

通过对这些掠夺者、捕猎者的刻画，印刷语言效应中的极端形象得以呈现。但随着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变得日益复杂，新的差异不断出现，冲突拥有了其他的表现形式。在《拓荒者》中，坦普尔顿镇的大法官象征着新出现的信仰系统，他坚持认为个人的权利由社会决定，而在奈特看来，相信自然和上帝的力量更加重要。这种冲突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规范、道德准则与强调土地和自然观念的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奈特的最终失败暗示白人作者库柏更倾向于放弃完全依赖自然观念的想法，去探索一种所谓更为现代化、更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观念。这一点在《拓荒者》中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复杂形象方面得到了体现。坦普尔顿镇的原型位于奥茨高（Otsego）湖畔，那里曾是库柏父亲的属地，印第安人世代居住于此。故事发生在1790年左右，当时美国的社会形势与其建国初期相比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如1790年印第安人与白人在奥茨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798年颁布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对非欧裔族群施加了多重限制。这些彼时现实场景中的讽刺意味和悲剧色彩在《拓荒者》的主人公邦波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邦波具有悲剧性的矛盾特点：他是白皮肤的印第安人，几乎不识字，与“文明人”可以使用各种语言赋权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反对对大自然灭绝式的掠夺和捕猎行为，维护大自然的权利。在19世纪早期，科技被展现为“先进”和“理性”的代表，而自然这种非理性力量则被视为远低于科技的存在。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邦波保护大自然的选择显然并不明智，但邦波始终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的希望：“远处山峦起伏的轮廓，覆盖着山毛榉和枫树的森林，给人一种放松的感觉，也给人一种更亲切的土壤的希望。”（Cooper, 1832: 44）

在《拓荒者》中，另一位引人同情的人物是约翰。在描绘他的外表时，白人往往用一种不乏贬抑的口吻：“他的身上披着一张没有加工的鹿皮，因怕它从肩膀上滑落，又特地在腰部用树皮束了一下。”（Cooper, 1832: 20）即使后来约翰皈依了基督教，白人还是把他视为一个“野蛮人”：“这就是混血儿通常不愿意离开野蛮状态的原因。他们对流浪生活的依恋，我真的相信——是不可征服的。”（Cooper, 1832: 263-264）约翰生活状态的原始和贫穷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人物大法官的奢华生活形成了强烈反差。小说中大法官一家衣着华丽，享受着当时最新的科技产品所带来的便利，乘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去做礼拜，他们的豪宅距离约翰的小木屋并不遥远，是一座全部由巨石和高级木料建成的庄园。

约翰对这种不平等痛心疾首，他留恋从前那种未被白人文明“开化”过的部落文明，拒绝接受复杂的种族关系，希望消除种族间的差异。他说：

上帝给了你父亲白色的皮肤，却给了我红色的皮肤，然而他赋予了每一个人流着同样血液的心脏……不同肤色下的这一切有什么不同吗？没有。

(Cooper, 1832: 403)

奥利弗是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但始终不被白人社会彻底接纳：“他流着印第安人的血……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基督教礼拜，（似乎）都无法彻底消除他身上的邪恶。”（Cooper, 1832: 134-135）虽然妻子是纯白种人，但奥利弗曾被大法官用枪指着头，他也因此痛恨白人殖民者的残暴。

这些描写反映出北美早期社会的复杂状况：自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虽然已经获得独立，然而广阔的土地、多元的族裔、复杂的信仰体系使这一新兴国家面临很多危机与挑战，其中很重要的挑战之一便是如何建立起这一新成立的国家的所谓的民族精神。针对各种政治关系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共同体”，库柏发出了对印第安原住民文化的呼唤，他在小说中深情地写道：“萨斯昆那条大河的源头蜿蜒流过山谷，汇成小溪，直到形成美国最令人骄傲的大河。”（Cooper, 1832: 1-2）这里的“源头”和“小溪”便象征着印第安文化的基础。

此外，库柏的小说特别强调了情感描写和想象过程对塑造和书写北美原住民文化的重要性。在《拓荒者》中，坦普尔顿镇里的欧裔移民，无论人种或口音如何，无不自认为是美国人，因为他们在对殖民地的想象中产生了共通感（Cooper, 1832: 115）。《拓荒者》还描写了印第安人和白人互相帮助的情景，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理解，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差异问题“想象的”解决策略，如《拓荒者》中邦波和约翰之间就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此外，《最后的莫西干人》中印第安人纳蒂和白人科拉同样交往密切。科拉能够发现印第安伙伴道德上的闪光点，并且驳斥他人对印第安人肤色的贬损：“难道就因为这人的举止和我们不一样，他的皮肤黝黑，我们就不信任他吗？”（库柏，2002：14）然而，库柏也描绘了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另一种互动：印第安人麦格瓦被族人视为令人鄙视的叛徒，他们认为他与白人的来往削弱了印第安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

麦格瓦出身大湖区红人的休伦族，生来就是一个酋长和战士；在第一次见到白脸孔前，他曾看到过二十个夏天的太阳把二十个冬天的积雪化成流水，淌进小河。那年月，他是很快活的！后来，那些加拿大父亲闯进了林子，他们教会他喝火水，这一来，他就变成一个无赖汉了。

(库柏，2002：115)

根据安德森的阐释，这些互动和冲突所导致的分裂均源自北美殖民地这一背景条件：“‘白种的’拓垦殖民者和‘黑种的’奴隶以及半灭种的‘土著’相对立的美洲社会内部分裂的程度是欧洲难以望其项背的”（197）。在这里，北美白人殖民者所坚持的立场与任何形式的文化多元论都是冲突的，印第安人更是无法接受其立场。

二、话语同时性的时间地理坐标与库柏作品的印第安叙事建构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在发展过程中突破了以往民族研究的社会学因素，认为“话语同时性”的形成是关键之所在。在该分析框架中，安德森借用了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理论。在安德森看来，话语同时性是“创造意义的经历”的“旅程”，它将“时间、地位与地方”一并联系到“想象的共同体”中（52-53）。安德森认为，文化认同与把“时间”理解成横向的、非同一性的、同质的、空洞的概念密切相关（23），这种理解方式同时也与民族有关：

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因为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

（24）

基于对传统历史观的批判，安德森注意到，“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成员在对自身进行定位时，会把自己放在某个限定好的历史范围之内，唯有这样他们才能把自己放在并存的时间感受之中。总而言之，在安德森的概念中，“话语同时性”不仅有明确的时间坐标和地理坐标，而且这两种坐标在“想象的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同等重要。在叙事时间上，《拓荒者》中处理角色的一个方式值得关注：库柏故意安排印第安人角色的出场时间晚于欧裔美国人，而且在前几章中从未提及印第安人寻找居住地的事情。通过这种安排，库柏在开篇便向读者暗示：印第安文化此时还没有显示出清晰的时间坐标。这与安德森历史观中的时间观念相契合。《最后的莫西干人》也被处理成前后两个对称的结构：小说的前半部分（前十六章）描述了上校的两个女儿从所谓的文明世界来到荒野，涉及的角色既有白人也有印第安人，他们共存于一个危险而混乱的地方；而在后半部分（后十六章）中，人物进入了印第安保留地，这里则是一个完全没有白人的世界。

库柏通过清晰的地理边界来呈现民族事件的变化，而不是按照事件的偶然

性来进行排列。地理区域中景物的移动会唤起人们对社会关系的感知,可以反映殖民地的复杂情景。地理边界的变动和风景的移动与社会关系改变相对照,是《拓荒者》叙事建构的核心要素。《拓荒者》的英文标题为 *The Pioneers; Or, The Sources of the Susquehanna: A Descriptive Tale*,也就是说,库柏一开始就将这一故事明确定义为“描述性的”(descriptive),即通过描述地方和风景来呈现叙事的发展。风景不仅是静态的背景,而且是独立的具有创造性的生命体,地理概念与时间概念相互作用。库柏在描述风景时使用了多个词语,如“大地”“大自然”“荒野”“西部”等,拓展了其小说的表达内涵。土地的变动是《拓荒者》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印第安人在失去土地后变得漂泊无依。库柏(2002:145-146)在《最后的莫西干人》中是这样感叹的:“从前,他家不必经过别人的溪流和山冈,就能在自己那块比大庄园主奥尔巴尼的领地还要大的土地上打猎,可是现在留给他的后代的还有什么呢?”在《拓荒者》中也有类似的对照:随着拓荒者的到来,森林、山路、野兽这些自然力量都消失不见了,土地的边界扩大至所谓的“文明世界”,出现了教堂、花园、田庄、耕地等人造风景意象。在边界扩大后,话语揭示了多元的民族张力,土著印第安人(如奥利弗、邦波、约翰)、白人殖民者(如坦普尔顿镇大法官一家、比利、琼斯)和黑人开始同时发声。库柏的写作以描绘印第安本土景致以及印第安人对土地山川和万物的眷恋建构叙事世界,将自然景观与话语同时性相连接,创造意义的想象空间。

在写作形式上,库柏发展了新的叙事结构和叙述声音,证明了外在环境和心理因素的分裂对文本效果的影响。在《最后的莫西干人》中,作者故意将时间倒流,使英法七年战争和文学文本并行,在保持故事神秘感的同时,提醒读者阅读文本并进行自己的阐释。《最后的莫西干人》主要从主人公邦波的视角展开叙述,但邦波是否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呢?邦波的性格总是那么诚实,这让他有资格成为一个叙事媒介,进而尽可能中立地记录下外部的动作、声音等。但是作为一名叙述者,邦波可能也不是那么可靠,正如爱默生对邦波的评价:“不管他的年纪多大,他都是个孩童。”(Emerson, 1909:15)实际上,读者可能会质疑邦波的所思所感,但孩童般的邦波意味着作者库柏超越了传统的全知全能视角,他更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聚焦印第安族群的叙事。同时,库柏选择将邦波的声音置于中心,而没有选择原住民钦加哥和恩卡斯的声音,是在有意地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叙述原住民的故事,在书写人物命运时与传统的时间感受和空间感受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作者的声音能在其中显现,烘托出对叙事对象的距离感,这样可以凸显作品的虚构性特征。与此同时,邦波的叙述总是充

满着矛盾、扭曲和怪异的心理感受。在小说开篇，钦加哥和邦波就在讨论土地的所有权问题，而直到小说结尾两人也未能达成最终的协议，于是邦波说要让上帝来判断，但上帝只存在于白人的世界。为了能够让读者理解这种对抗和复杂感受，库柏选择了“用旧身份中日益严重的危机在情感上支持（人物）当时为自己想象的新身份”（Franklin, 2007: 275）。这也揭示出库柏在印第安书写中的情感倾向：希望从人性关怀的角度给予历史新的表现方式，在历史材料的改编中注入人性思考，从而在反思中建构印第安叙事。

三、“想象的共同体”与北美早期印第安书写中的叙事建构

威尔·金里卡指出，“想象的共同体”有助于实现一个建立在多维视角下的公民社会（Kymlicka, 2001: 26）。格罗斯比（2017: 6-11）认为，民族的核心特征包括长时间持续存在的时间深度、记忆和领地；他将民族定义为一个具有亲属关系的共同体，具体地说，是“由出身情况决定的、居住在一个领地内的共同体”。印第安书写从早期就以多元视角看待不同种族文化间的冲突。维克多·特纳说：“边疆地区的形成促进了美国人多元的民族性发展。沿海地区主要定居着英国人，而随后的大陆移民浪潮则涌向了自由的土地。这种局势从早期殖民时期就开始显现。”（Turner, 1985: 44）印第安书写将“想象的共同体”与“身份建构”并置。小说家路易·欧文斯指出：“身份建构这一尝试就位于美国早期印第安文学的核心。”（Owens, 1992: 1）欧洲殖民者以宗教为幌子，大肆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剥夺他们的身份。库柏在小说中以自身视角建构了印第安人的身份，强调保留种族记忆并寻求融合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从萌芽阶段开始，印第安书写就自豪于自己的民族身份。这种印第安民族叙事记录下了北美民族性早期的萌芽状态，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在库柏的同代人及后来者那里得到了呼应、继承与发展。詹姆斯·E. 西弗（James E. Seaver）发表于1824年的《玛丽·杰米森的一生》（*A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Mrs. Mary Jemison*）是一位妇女的回忆录，她12岁时被印第安塞尼卡人（Seneca）掳走，并在印第安文化中生活了65年之久。这部小说采用女性视角来看待殖民地白人与印第安族群间的问题，“白人妇女（杰米森）变成印第安土著，再也没有回归文明，这个故事采取了一种父权制度的修辞策略，以指出人们对美国民族历史的误解”（Montón, 2010: 76）。通过这种对族裔历史误解的聚焦，并结合性别问题，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单一的身份建构，希望打破欧裔移民者想象的局限，建立起印第安人自我、社会和国家“想象的共同体”。

凯瑟琳·M. 塞奇威克 (Catherine Maria Sedgwick) 发表于1827年的《莱斯利的希望》(*Hope Leslie*) 表面上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 背后却隐藏着印第安原住民的一段历史记忆, 即关于佩奎德酋长的传说。在小说中, 叫作“信念”(Faith) 和“希望”(Hope) 的两个孩子从英国移居到美国, 她们是清教殖民者的代表, 由代表印第安文明的酋长的两个孩子负责照看。小说详细叙述了酋长突袭、血洗和绑架白人家庭以及殖民者追捕印第安反抗团体的过程, 其中一段提到酋长要将白人作为祭品而酋长女儿却帮助白人逃出印第安营地的故事。这两部小说都反映了19世纪早期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态度: 一方面将其视为野蛮的土著加以压迫, 另一方面又对其怀有同情之心。约翰·奥古斯都·斯通 (John Augustus Stone) 1829年发表的作品《最后的一位万帕诺亚格人》(*Metamora; Or the Last of the Wampanoags*) 是一部戏剧体裁的悲剧, 故事发生在17世纪清教徒到来前后的美洲, 梅塔莫拉 (Metamora) 是一位高贵纯洁的印第安英雄, 他在被英国军队击败后用刀与英军对峙, 最终被子弹击中, 在诅咒英国人的同时不屈地死去。这部五幕悲剧全面地展现出他与英国清教徒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小说将印第安族群灭绝的悲惨历史与有关印第安酋长的浪漫传说融合在一起, 凸显了印第安人为争取自由而不断奋斗的精神。《乔亚昆·穆里埃塔冒险记》(*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Joaquín Murieta*) 出版于1854年, 是第一部美国本土族裔用英语写作的小说, 作者约翰·罗林·里奇 (John Rollin Ridge) 利用传记体形式刻画了穆里埃塔这个印第安民族英雄的形象。为了破除北美早期移民社会中流行的印第安人嗜血残暴的刻板印象, 里奇把这个主角塑造得十分英勇果敢、无所畏惧。长期以来, 印第安人在白人文学作品中处于弱势地位, 而里奇力图用正面的印第安人形象来象征本土文化。出版于1855年的《海华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 是一部描写印第安人的叙事长诗, 它将口头叙事和印第安人的精神实质及其对身份的寻求结合得十分紧密: 喜欢恶作剧的精灵纳纳伯周 (Nanabozho) 不断出现在故事的进程中, 而作为主角的海华沙在故事中却总是缺席, 在场与缺席的强烈对比似乎在说明, 即使海华沙已经死亡, 印第安人的民族精神之源——力量、勇气、仁慈和智慧——也不会消失。诗篇扩大了对印第安人精神的现实表征, 使之与想象空间中的物质性——各种大自然的意象、印第安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及印第安象形文字——相对应, 因此这部长诗表面看来是印第安口述文学, 但在更深的层次上, 其写作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出版于1891年的卡拉汉 (S. Alice Callahan) 的小说《森林之子瓦妮玛》(*Wynema: A Child of the Forest*) 以印第安女性视角描述了印第安人在教育上与白人发生的冲突, 呼吁印第安人在多族裔的社会中从被动的文化身份跃升

为拥有更多自我决定权的身份；同时这一印第安书写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觉醒意识。

北美早期的印第安文化书写者如伊斯特曼（Charles Alexander Eastman）、拜尔（Luther Standing Bear）、奥斯奇森（John Milton Oskison）、马修斯（John Joseph Mathews）等人的作品均清晰地展现了当时印第安人的悲惨生活和不幸遭遇，着重刻画了白人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与交往，同时揭示了印第安人身份建构的复杂性。这些早期印第安作家建构民族身份的第一步是重述传统。印第安部落在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口头叙事是印第安民族最宝贵的财产，对印第安部落的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作家们通过展示印第安人独特的文化以及塑造拥有正面形象的印第安人主人公，力图改变殖民地早期认为印第安人原始愚昧的刻板印象，从而建立起民族归属感。在此基础上，作家们第二步书写的是白人的殖民过程，印第安文明被象征先进和现代的科技及印刷语言击败，呈现出分裂和失序的格局。与此同时，白人殖民者远离母国，开始将美洲的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家园。因此，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冲突和共存关系，双方都有各自的身份焦虑，彼此相互交织，并与居住的土地紧密相联。叙事话语成为印第安人身份建构的表达方式。最后，印第安书写走向第三步，摒弃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面对多元杂糅的文化，将不同族裔的声音联系在一起，使读者感受到话语同时性的内在张力，从而进行印第安人独特身份的话语建构。

结语

本文在叙事话语分析中以“想象的共同体”为视角，探讨了北美早期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在印第安书写中，印第安人寄望拥有动态的、主动的、多元的话语空间。然而，认同感在话语中受到消融和凝结的双重限制。库柏的小说一方面强调自我发现的认知过程，试图消除印第安人在冲突过程中对民族宿命论的认同，取而代之的是对本族群文化的自豪回应；另一方面，小说集中展现了历史在场证明，呈现了由族裔差异引起的深刻冲突，尝试探索多重身份建构的可能性。然而，不同族群的身份建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印第安人的身份建构依赖传统，其族群成员从传统中寻找历史记忆，而殖民者的身份建构则具有垄断意识。这些不同族裔不同身份的身份建构是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同时展开的。北美早期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透射出印刷语言以及时间空间坐标上话语同时性的效应。早期印第安书写因此拥有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通过多元的发展和

变化展示了北美文化图景的变迁,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丰富了北美民族文化的想象空间。以具有内在张力的“想象的共同体”为批判视角,本文尝试重新解读多元格局下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审视历史书写空间,建立地方性的想象,从而为印第安书写以及叙事研究提供更为广泛的阐释框架。

(本文通讯作者为张叶鸿。)

参考文献:

- [1] COOPER J F. *Notions of the Americans: Picked up by a Travelling Bachelor* [M]. London: Henry Colburn, 1828.
- [2] COOPER J F. *The Pioneers; Or, The Sources of the Susquehanna: A Descriptive Tale* [M]. London: Henry Colburn and Richard Bentley, 1832.
- [3] EMERSON R W. *The Wor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Vol. I* [M]. Boston: Liberty Fund, Inc., 1909.
- [4] FRANKLIN W. *James Fenimore Cooper: The Early Years*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 KYMLICKA W. *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Citizenship*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6] MONTÓN E D. “A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Mrs Mary Jemison”: Rhetorical drag and the defiance of hegemonic cultural models [J]. *Atlantis*, 2010 (1): 73-86.
- [7] OWENS L. *Other Destinies: 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Indian Novel* [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 [8] TURNER F J.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M].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85.
- [9] 埃利奥特. 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M]. 朱通伯, 译.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4.
- [10]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11] 格罗斯比. 民族主义 [M]. 陈蕾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
- [12] 库柏. 最后的莫西干人 [M]. 宋兆霖,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收稿日期: 2021-11-30

作者信息: 欧阳立博,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 100084,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认知文学。电子邮箱: oylb20@mails.tsinghua.edu.cn
张叶鸿, 博士,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 博士生导师, 100084, 研究方向: 文学理论、认知文学、世界文学。电子邮箱: zhangyehong@tsinghua.edu.cn

(下转第146页)

to make full use of ChatGPT in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teaching, to reform the teaching process,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learn autonomously, to increase education in translation ethics, to control ideological risks, and to enhance teachers and students' digital literacy.

Keywords: ChatGPT; NLP machine learning model; translation teaching; digital literac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责任编辑:刘继安)



(上接第 133 页)

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s in Early Native American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Ouyang Libo / Zhang Yeho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rratives in early Native American writing,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magined communities which acts as an emotional catalyst, fusing conflicts caused by ethnic disparities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of complex identities. By identifying two dimensions of early Native American writing—the emotion expressed in the literary works and the historical presence in space which strengthens this emotional effect—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This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forms a contradictory but coexisting tension in the new continent of North America. The narratives reveal the role of print-languages and simultaneity-along-time in founding the imagined community.

Keywords: imagined communities; narratives; print-languages; simultaneity-along-time; early Native American writing

(责任编辑:栗娜)